



与我们的未来

一九八四

ON NINETEEN EIGHTY-FOUR : Orwell and Our Future

[美] 阿博特·格里森 [美] 玛莎·努斯鲍姆 [美] 杰克·戈德史密斯 编

Edited by Abbott Gleason Martha C. Nussbaum Jack Goldsmith

董晓洁 侯玮萍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一九八四》 与我们的未来

[美] 阿博特·格里森 [美] 玛莎·努斯鲍姆 [美] 杰克·戈德史密斯 编

Edited by Abbott Gleason Martha C. Nussbaum Jack Goldsmith

董晓洁 侯玮萍 译



ON **NINETEEN**
EIGHT

Orwell and Our Fu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 / (美) 格里森
(Gleason, A.), (美) 戈德史密斯(Goldsmith, J.),
(美) 努斯鲍姆(Nussbaum, M. C.) 编; 董晓洁, 侯玮萍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书名原文: ON NINETEEN EIGHT – FOUR: Orwell
and Our Future

ISBN 978 – 7 – 5118 – 4314 – 2

I. ①一… II. ①格… ②戈… ③努… ④董… ⑤侯
…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评论—英国—现代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3105 号

《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

[美] 阿博特·格里森
[美] 杰克·戈德史密斯
[美] 玛莎·努斯鲍姆 编
董晓洁 侯玮萍 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社
策划编辑 柯 恒
责任编辑 柯 恒
特约编辑 冯雅杉
装帧设计 马 帅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 沙 磊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21.25
字数 283 千
版本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 ISBN 978 – 7 – 5118 – 4314 – 2

定价: 4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献 辞

当研讨会组织者决定将此书献给鲍勃时，作为与之结婚三十七年的妻子，我感到非常高兴。如果鲍勃泉下有知，也一定会欣慰，因为他在人权领域的工作获得了同事的认可，毕竟鲍勃生前就非常尊敬和推崇这些推动社会发展的同仁。激情指引着鲍勃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凡是和他有过私交的人都知道，鲍勃从不畏惧在适当的时机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把自己广泛的学术兴趣服务于社会，同时还保持着谦逊和自我克制的品格，这在颇具影响力的成功人士之中是非常少见的。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学时代起，鲍勃就敢于对权力滥用说不。他在大学时曾撰写过一篇论文，矛头直指国会众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校方甚至拒绝将其发表。鲍勃的如此行为并非毫无原因，他曾经眼睁睁地看着父母的诸多朋友遭到起诉与定罪，只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自由立场或者社会主义倾向。很多人被迫走下讲台，有些甚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那以后，鲍勃就开始从很多方面向权力滥用开炮，但触发点都在于人类对同胞的非人道行为。

在阿根廷与人类学家克莱德·斯诺共事的那段时间里，鲍勃意识到法医病理学有助于记录践踏人权的种种暴行。他们不久前通过研究尸骸，辨认出两百多名空难遇害者的身份，并意识到这种方法能帮助鉴定死于阿根廷军政党派之争的受害者。这是鲍勃人生中的转折点。他不仅检验那些“失踪人员”的尸骸，而且探究他们的死因。他与死于当局之手的受害者家属促膝长谈，尤其是遇害学生的家属，这更加坚定了他搜集证据

以将施暴者送上法庭的决心。当几位军队领袖纷纷被以战争罪起诉时，鲍勃的工作也获得了认可。

在辗转各国的工作中，鲍勃常常受到人身威胁。当然，他尽力保全自己，完成了三十六次工作任务。他与诸多国际组织密切协作，并受益于它们的建议和协助，尤其是人权医生组织（PHR）、大赦国际和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鲍勃认为，他所从事的许多志愿工作很可能让当事国本国的社会活动家身陷囹圄，甚至招来杀身之祸。鲍勃经历过一场牢狱之灾。在肯尼亚调查一个政治犯的死因时（当局声称此人是在警察看守下自杀身亡的），他突然被人从法庭上赶下来，随即被投进了监狱。幸运的是，此事被 BBC 一位记者获知，并且立即报告给美国大使馆。这件事让我们非常担心，人权医生组织负责此事的苏珊娜·瑟肯也是如此。当美国大使馆向当局施压后，鲍勃终于获释，我们才长舒了一口气。

军事机构或者警察勾结犯下的暴行是鲍勃工作的重心。他小心翼翼地记录受害者的伤口类型，以尽可能精确地记载所使用的工具、伤口的形成过程以及时间。他偶尔调查一些个案（当事人通常是政治犯和社会活动家），足迹遍布捷克、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以色列、肯尼亚、韩国等地区，但他的主要研究对象还是大规模暴力活动（波斯尼亚、萨瓦尔多、危地马拉、卢旺达和土耳其）。和他共同调查这些大规模暴行的同事很多，我只能列出部分人的名字：文斯·伊科皮诺、比尔·海格兰德、艾瑞克·斯托弗；还有一些当地的社会活动家，在此我不便说出他们的名字。鲍勃被任命为《伊斯坦布尔宣言》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起草者，这是一部关于酷刑和非人道刑罚的手册，已经提交给了联合国，他为此深感欣慰。

身为人父，最让鲍勃无法释怀的一次事件，是发生在萨尔瓦多一个小村落莫佐特的大屠杀，其中有六十多个死难者都不满六岁。凶手认定这些孩子日后可能成为“游击队员”，便将他们近距离射杀。为了防止被人发现，尸体被藏在像小山一样的泥土堆里。掌权者对当地族群的污辱和压制让鲍勃忍无可忍，终其一生，他都在跟这些掌权者作斗争。

美国也存在由警察实施的暴力活动。鲍勃可以从以往的工作经历中

举一反三，比如芝加哥警察局长伯格一案。囚犯们专门指出自己在伯格的辖区内遭受了某种酷刑。虽然公民对抗市警察局的案子显然是有政治风险的，但鲍勃还是前往调查，并且得出了结论：只有经历过那种电击的人才会留下那样的伤疤，才能如此详细而准确地描述当时的感受。在法医学证实了这些申诉后，后续案件得到了调查，伯格下辖区域的类似酷刑案件也得以证实。尽管一位法官明显试图否定鲍勃的专业知识，声称没有什么学科包含与折磨相关的专门知识，但随着证据公之于众，伯格还是辞职了。

鲍勃认为，死刑是权力滥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在很多死刑案件中作证，描述了行刑过程中个体可能经受的痛苦。尤为糟糕的是，至少有两次，行刑工具出现了故障，或者由于操作失误而着了火。

鲍勃在虐童领域的工作对许多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对医学生和住院医师，以及警方和其他病理学家的教育意义尤甚。他在主流教科书上撰写了很多文章，在当地以及全国巡回演讲，以便引起人们对虐童问题的关注。他和美国儿科学会下属的儿童虐待和忽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共同撰写指南，指导对性侵犯、婴幼儿意外死亡、婴儿摇晃症候群的认定。他为被看护者虐待或杀害的儿童作证，希望负责起诉这些罪行的相关人员（律师、法官、社会工作者）明白问题的严重性，让受害儿童获得正义的对待。从法庭上回来，鲍勃经常是怒气冲冲，因为有裁决权的那些成人宁可相信家长自治的神圣性，也不愿相信明摆着的相关证据。

鲍勃和杰奎琳·巴巴、拉希姆·卡里地携手创建了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夙愿——能够影响更多的学生投身人权事业。人权项目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学生，他们拥有不同的经历、各异的天赋和同样的奉献精神，这让鲍勃非常欣慰。目前，人权中心的负责人是苏珊·戈什。

从个人的角度讲，我们全家——就像世界上很多家庭那样——对鲍勃充满了尊敬和爱意。在个人参与的所有事情中，鲍勃都是如此突出。他不知道拖延为何物，从不浪费时间。此外，幽默感始终伴随着他，即使

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他总是能让自己和同仁的士气高涨起来。他对古典音乐了如指掌，多年来乐于沉浸其中——尤其是和谋杀相关的歌剧，比如《铁面人》、《彼得·格利姆斯》。我们的艺术品位比较相似，都喜欢描绘人类境况的作品，比如德国表现主义派和当代墨西哥大师（包括利维拉和西凯洛斯）的手笔。在担任“最后的话”社团（此社团致力于用法医学的视角研究艺术与历史）主席期间，鲍勃将文学、历史、艺术融入到美国法医学协会的各项工作中。

鲍勃的离去让我非常痛心，我们的儿子乔什、丹和奔吉，还有很多亲友也都如此。不过，因为还有深受鲍勃影响的学生在，还有活跃于世界各地的同仁在，鲍勃为之奋斗一生的人权事业后继有人，想到这里，我还是感到了一丝欣慰。

医学博士巴巴拉·S·基尔施纳尔
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致 谢

1999年,为了纪念奥威尔小说发表五十周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这本论文集也就应运而生了。研讨会是由法学院校友、律师马文·J·罗森布拉姆发起的。他对奥威尔研究情有独钟,曾从索尼娅·奥威尔手中拿到了小说的影视改编权。随后,罗森布拉姆律师成为了影片《一九八四》的监制。该片由迈克尔·莱弗德担任导演,约翰·赫特扮演温斯顿,理查德·伯顿扮演奥勃良。罗森布拉姆还找到努斯鲍姆和戈德史密斯,建议在母校举办一场研讨会,庆祝小说发表五十周年,并探讨它对当下美国的意义。我们感谢马文对奥威尔研究的付出,以及他独到的观点和不倦的热情;还要感谢法学院院长道格拉斯·比尔德,他让我们负责与马文的接洽事宜,统筹策划研讨会的各项程序。下一任院长丹尼尔·费希尔非常慷慨地支持了此项活动,我们衷心地感谢他在行政和资金方面提供的援助,还要感谢对外联系部主任希尔维亚·奈尔对此次活动的鼎力相助。哲学系的博士生查德·弗兰德斯作为研讨会助手,在通讯联络和具体组织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负责社会运营的露茜恩·古德曼,她的高效率和高品位众所周知。

在接下来的编辑过程中,我们非常幸运能和查德一同工作。他负责修改文章,并与作者联系。在项目的最后阶段,查德的工作由马克·约翰逊接手。在处理繁琐细节的过程中,马克一直保持着高昂、优雅、高效的工作风格。与此同时,艾伯特·格里森也同意加入编辑组。努斯鲍姆和戈德史密斯非常赞赏格里森的勤勉工作,包括他对最后修订稿的仔细检

查,以及在撰写引言时提供的帮助。最后,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伊恩·马尔科姆,自始至终,他都给我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鼓励我们继续努力。还有两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评审人,感谢他们宝贵的修改意见。

有一位作者为此次研讨会的召开贡献了很多力量,不幸的是,我们没能收入他的文章。他就是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教授罗伯特·基尔施纳尔,享誉全球的酷刑法医病理学专家,人权医生组织的领导者,芝加哥大学人权项目的奠基者之一。在与癌症斗争了多年之后,基尔施纳尔于2002年逝世。早些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自己可能无法完成论文。在此谨将本书献给鲍勃,以表彰他多年来的工作和整个人生。他的逝世,无论是对整个社会,还是社会的正义事业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非常感谢鲍勃的夫人巴巴拉为本书作序。

本书中的引文均来自同一版本的《一九八四》,括号中的数字是引文在该版本图书中的页码。

目 录

献辞		1
致谢		1
引言		
阿博特·格里森 玛莎·努斯鲍姆		1
Part I	政治与文学畅想	13
	为诗歌辩护(裘莉亚的论文)	
	伊莱恩·斯卡丽	15
	双重言论与一个人的少数	
	霍米·K·巴巴	33
	人与兽:奥威尔的兽性观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43
	文学作品能起到社会科学的功效吗?	
	理查德·A·爱泼斯坦	55
Part II	真相、客观性和宣传	77
	冷战时期的清教和强国政治:奥威尔与历史客观性	
	阿博特·格里森	79
	罗蒂和奥威尔的真相观	
	詹姆斯·科南特	93
	从英社、新话到美资、美国正义论与商话	
	爱德华·S·赫尔曼	120

Part III	政治压迫	133
	论《一九八四》中的思想控制:当想象变为现实	
	菲利普·G·津巴多	135
	你相信谁? 你又指望什么?	
	戴瑞斯·瑞嘉利	164
Part IV	技术和隐私	191
	奥威尔与赫胥黎:经济学、技术、隐私与讽刺文学	
	理查德·A·波斯纳	193
	论互联网及《一九八四》的良性侵犯	
	劳伦斯·莱西格	222
	带有“自身阻断性”的预言	
	大卫·布林	234
Part V	性与政治	247
	性自由与政治自由	
	凯斯·R·桑斯坦	249
	性、法、权与社会	
	罗宾·韦斯特	260
	《一九八四》、天主教与人类性行为的意义	
	约翰·霍尔丹	282
结 语	同情心的泯灭:奥威尔和美国的政治生活	
	玛莎·努斯鲍姆	301
作者简介		323

引 言

阿博特·格里森 玛莎·努斯鲍姆

当人们觉得乔治·奥威尔即将告别历史舞台时,他却仍然是当代政治生活的焦点。在大众心目中,奥威尔是个批判苏联的小说家,擅长渲染冷战时期的价值观。《一九八四》出版于1949年,恰逢冷战的开端,因此,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揭露斯大林式恐怖的代表作。它是无数美国高中生的必读书目,因为它出色地描写了孤立的个人如何与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国家作斗争。这个国家系统地、无情地践踏真理,篡改历史,扭曲人际关系;最可恶的是,国家完全否定了个人的意志。小说的结尾令人不寒而栗,温斯顿·史密斯最终还是爱上了老大哥,从此便再也没有自我意识了。这个富含道德意味的故事,预示了人类的灰暗前景,所有人可能都无法避免这个结局,即人性的死亡。

苏联已经分崩离析,奥威尔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事实上,就在小说所描绘的政治环境消失时,当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科技手段,又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了奥威尔的小说。这本书中的论文,来自1999年的一场研讨会。为了纪念小说出版五十周年,与会者探讨了《一九八四》何以能够超越具体时代的局限,以及留给了后人何种启示。《一九八四》一直处于流行文化的中心,我们试图超越冷战思维,探讨是哪些主题使得这部小说牢牢嵌入了美国人的潜意识中。在时代已然巨变的情况下,我们的思想还在受

到《一九八四》的影响吗？1949年，这部小说同时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发行。它的英文版不断重印，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几乎囊括了欧亚大陆的所有语言，是历史上流传最为广泛的小说之一。

这本文集，以及这次研讨会，不是为了发表对奥威尔的评价。事实上，我们特意没有邀请奥威尔研究的专家学者，也不想寻求什么标准的文学解读。我们邀来了法律以及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学者，请他们表达自己对于这部小说的看法，并告诉读者大众，当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这部小说对我们会有何教益。我们寻求针锋相对、特立独行的观点。这些学者之中，有些人就认为奥威尔的小说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或者他在某些方面大错特错。尽管如此，大多数作者还是认为《一九八四》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即使小说中也许存在若干谬误之处，但它所激发的思考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关于《一九八四》，有五个话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首先，这部小说在我们文化中的地位所引发的一个宏观性的问题便是，虚构文学作品应该在政治上扮演什么角色？这是奥威尔终其一生都在考虑的问题。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为何要创作小说？小说又能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事件？其次，这部小说围绕着真相及其与政治自由的关系展开，那么相信真相（科学的或者历史的）可得的信念和自由民主社会的可持续性之间有何关联？第三，小说最为人所知的一点是描写了技术手段维持的暴政，而今天我们生活的社会，监视和控制技术所提供的可能性，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奥威尔的想象。那么，他的恐惧变为现实了吗？未来又将如何？技术本身有什么特质能够减轻奥威尔提出的担忧吗？第四，小说详细描写了酷刑和思想控制，和1949年相比，我们对这一主题的了解丰富了很多。如何用历史经验和心理学研究解释奥威尔噩梦般的深见，即人性可能被心理手段击溃？最后，就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性。在奥威尔笔下，温斯顿和裘丽亚的恋情中，性爱激情和政治反抗紧密相连，性压迫和极权主义密切相关。这种关联有何依据？小说中的处理是否得当？小说在性爱管制和政治中的性爱隐喻方面，给了我们怎样的启发？

这些就是我们将要探讨的主题；毫无疑问，在评价奥威尔所做贡献的性质和价值时，我们将听到大相径庭的观点。

世界瞬息万变，犹胜以往。很快，我们就从后冷战时期的1999年，跨越到了后“9·11”时期，这又是一个崭新的时代。“9·11”事件之前，冷战的政治思维继续指导着美国的对外关系，即使在布什政府早期，依然如此（即俄国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自由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而现在，世界格局陡变，我们的敌人不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一群不知其藏身何处、面目如何的恐怖分子，他们没有可被轻易粉碎的指挥枢纽，也没有联络地图。我们已经知道，或者至少可以大略地描绘出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一个阵营获胜了，然后输出自己的经济政治体系到战败的阵营。但是，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这场“新型战争”之后的场景：恐怖分子会消失吗？他们会变得热爱美国吗？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我们有必要再问一次，奥威尔的观点是否还和我们息息相关？

但是，尽管世界在不停的变化，我们依然能看到奥威尔的影子。比如，“美国的新型战争”（America's New War）这种词汇，不断地强调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中。当总统接受结肠镜检查时（2002年6月），尽管只是二十分钟的麻醉而已，他把权力移交给了副总统；可是，以往总统晚上睡觉以及白天打盹的时候，并没有移交权力。而且，以往有些总统还经历过更严重的医疗手术过程，他们也没有移交权力。为什么会要如此神经紧绷？因为，我们获知，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这就有必要让整个世界都看到我们在有条不紊地移交权力。

简言之，紧急状态是冷战的遗物，面对众多分散而非少数单一的敌人，我们只好对紧急状态进行再包装。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了奥威尔的影子，在这个尊重宪法和公民自由的国度，一切曾被质疑的手段都在紧急状态的旗帜下被合法化了。在这个早已不复当年模样的世界里，奥威尔的思想仍然适用，并且引人深思。

奥威尔明白，在恐惧和紧急状态下，人们就开始寻求慰藉与团结。我们的政治生活其实并没有脱离冷战的阴影，比如，最近在公开的政治骚乱

中，出自美国“效忠誓词”的一个说法——“在上帝的庇护下”——被频繁引用。这种词汇来自冷战的白热化时期，以显示我们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之分野。但是，它们引起了严重的宪法问题。学生因此将对祖国的效忠与信仰上帝联系起来，尽管很多道德水准颇高的人都不信仰上帝。（有些是无神论者，有些相信不可知论，有些人持守其他非一神论的宗教信仰，比如佛教和道教。联邦最高法院早有判例在前，明言“宗教”不是单指对上帝的信仰。）一个被长久争论的宪法问题是，当孩子被告知可以“选择不信仰”，但绝大多数人还在不断引用这种词汇时，他们无疑承受着潜移默化式的压迫与压力。所以，重新强调“在上帝的庇护下”这种词汇时，我们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少数群体的权利保护，冷战思维再次浮上水面。我们的对手不再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而是不信仰上帝的恐怖主义。我们目前的状况，再一次验证了奥威尔关于政治心理之描述的正确性。

二

第一部分 政治与文学畅想

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一个非常普遍而宽泛的话题：政治与文学畅想的关系。在《为诗歌辩护》一文中，文学家兼政治思想家伊莱恩·斯卡丽(Elaine Scarry)通过对小说原有文字的拓展，令人惊叹地阐述了这个主题。她的论文模拟了裘莉娅和温斯顿之间的通信，论证了人类的思考能力既依赖于历史，又依赖于虚构的文学的观点。要具备认清“目前的情况是什么”的能力，就得实际地思考“目前的情况不是什么”；这些能力也是维系裘莉娅和温斯顿的纽带。在大洋国，真实和想象中的非真实相互颠倒，但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必须扭转。裘莉娅认为，艺术佳作独立于这个世界，但又紧紧依存于世界的边缘。虚构的文学则兼具大量的事实描述和虚构的文学畅想。文学畅想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看穿这个世界，因为它能让我们集中注意力于某些方面，为我们揭示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东西，引导我们思考最深奥难懂的东西，而不必担心风险或者惩罚。

在《双重言论与一个人的少数》一文中,霍米·K·巴巴(Homi K. Bhabha)试图用奥威尔的例子来颠覆一种固有的观点,即道德高尚者不必是什么技术能人。和很多文学作品中的看法不同,霍米认为奥威尔没有那么直率,尤其是在“讲述暴虐的时候”,他是个具有独特技巧的能人。在巴巴看来,虽然奥威尔意在抨击极权,但他的语言本身却“充斥着对极权式暴力的想象”。奥威尔对伟大事业最偏执疯狂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具创造力和洞察力的时候。为了将温斯顿·史密斯塑造成捍卫真相的“一个人的少数派”,奥威尔必须另外塑造一个否定真相的角色。温斯顿总是渴望能和奥勃良交往,这是他为说出真相所进行的斗争的核心之一,毕竟说出真相只能通过对话来实现。

在《人与兽:奥威尔的兽性观》一文中,小说家兼评论家玛格利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将注意力放到了奥威尔小说的一个悖论上:奥威尔坚信兽的人性与人的兽性。“野兽般的”似乎是奥威尔学会的第一个词;通过他的母亲,奥威尔将这个词与“农家庭院”里家禽之间的交配联系起来。一个相关的悖论是:奥威尔热爱动物,但又和所有“真正的英国人一样”,热衷于猎杀动物。德拉布尔的文章同时提到了《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后者的核心情节就是“人变成兽”(以及兽变成人)。德拉布尔认为,只有在动物寓言里,奥威尔才能畅快淋漓地表达他所希望捍卫和保持的最本质的人性特质与道德准则;或许,只有在动物寓言里,他的笔触才能变得温柔一些。奥威尔同情男人、女人和野兽,但和人类相比,他似乎更容易对动物产生同情心。毕竟,对人类的同情必然包含着对他自身的怜悯,而奥威尔“对自己总是冷酷无情的”。

法学教授理查德·A·爱泼斯坦(Richard A. Epstein)曾用自由主义的视角探讨了诸多社会问题。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质疑了奥威尔文学作品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联性。爱泼斯坦坚持认为奥威尔的小说过多地依赖于奥威尔自身的经验,因此并不具有代表性。由此,爱泼斯坦得出结论:奥威尔的小说没能揭露太多他所鞭挞的国家机构的真实情况。他认为“文学可以让我们关注贫困问题,但是文学本身并不能反

映出贫困率的升降情况”。这类问题最好还是由经济学或者相关学科解决。他也承认,诠释某些特殊行为时,文学想象“比定量的社会科学更具优势”;在揭露扭曲人格和过度的集权主义方面,奥威尔表现得相当出色。不过,爱泼斯坦最终还是认为,在解释复杂的社会体系和提出改革建议方面,奥威尔和大多数小说作者都是无能为力的。

第二部分 真相、客观性和宣传

阿博特·格里森(Abbott Gleason)撰写了大量与二十世纪的苏联历史和冷战史有关的著作。在《冷战时期的清教和强国政治:奥威尔与历史客观性》一文中,格里森详细描绘了奥威尔在捍卫历史客观性方面做出的努力:从西班牙内战到冷战开始的十年内,他一直在探讨极权主义的问题。奥威尔对历史客观性的捍卫并非源自认识论的立场,而是为了反对极权主义,并涉及他多方面的研究:作为清教徒传统的个人主义、历史的相关性、文学的严肃性与公正性,以及对基于世界物质性的某些肤浅理论的批判。在《一九八四》的结尾,奥勃良让温斯顿完全屈服了。这一结局带有某种自传性色彩,暗示了奥威尔对自身命运的悲观,即极权主义的时代将毁掉他曾珍视的价值观。

在《罗蒂和奥威尔的真相观》一文中,哲学家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将奥威尔的真相观和作为当今学术热点的对真相与客观性的抨击进行了对比。他以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观点为讨论重点,后者认为应该以团结为原则来代替自由政体中对真相的不懈挖掘,并试图借用奥威尔来佐证自己对真相的抨击。科南特在分析了罗蒂的论证后认为,《一九八四》表明罗蒂和奥威尔根本不在同一条战壕里,而是针锋相对。奥威尔认为,要捍卫自由,就必须将真相和单纯的团结区别开来。“极权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的残忍,而是对客观真相这一概念的否认。从小说中看,罗蒂所秉持的更像是奥勃良的立场。

爱德华·S·赫尔曼(Edward S. Herman)是一位经济学家兼媒体分析家,他用批判的眼光比较了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和美国当下政治生活